

清代佛教史籍流传东亚考述*

曹刚华

内容摘要:清代佛教史籍体裁多样、数量众多,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也以各种方式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地。传入到日本的清代佛教史籍分为两种,或是随着《嘉兴藏》传入而传入,或是单本传入。传入到朝鲜的清代佛教史籍,有的被皇室收藏,进入大内书库,有的被寺院、重新刊刻。传入到越南的清代佛教史籍则较少。

关键词:清代佛教史籍 日本 朝鲜 越南 流传

中国佛教史籍^①肇始于魏晋,早期来华的印度僧人带来了佛教经典,其中有《龙树菩萨传》、《马鸣菩萨传》、《付法藏因缘传》等印度僧人传记,但是印度并没有重视这种史学撰述的继承,后续佛教史传不多。相反,这种史学撰述在中土传统史学的影响下开始兴盛,《高僧传》、《出三藏记集》、《比丘尼传》等大批佛教史籍应时而出,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籍之先河。可以说,自魏晋以来,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历史长河的更替,中国佛教史籍形成了一个特有的史籍系统,清代佛教史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清代佛教史学家撰述了《五灯严统》、《五灯全书》、《南宋元明僧宝传》、《现果随录》等一大批体裁多样、数量众多的佛教史籍。这些佛教史籍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也以各种方式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地。

* 本文系 2015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佛教史学批评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BZJ021)阶段性成果。

①佛教史籍的界定可以从广义、狭义两方面考虑。狭义的佛教史籍是指由佛教僧人或居士撰写的佛教史,包括纪传体、编年体佛史、僧传、寺志、灯录、经录等文献,文集与语录虽也有涉及佛教史的材料,但严格来说仍不属于佛教史籍,故不列入。广义的佛教史籍,与佛教史科学颇有相同之处,它包括所有关于佛教历史的文献记载,无方内、方外之分。如《魏书》、《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等中关于僧人的著作记载、传记以及方志、别史、经幢、碑铭等。参见曹刚华:《宋代佛教史籍研究·绪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一、清代佛教史籍在日本的流传

日本是中国邻邦,两国大规模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僧侣的传教与求法,包括思想、制度、文物和风俗在内的佛教文化形态^①。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形成高峰,大批的遣唐使和留学僧侣来到长安。宋代,两国的文化交流仍未衰退。宋初,就有裔然、寂照、成寻等僧侣来华访问参学,礼名山佛迹。《大藏经》的流传亦是当时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北宋雍熙年间,僧裔然与其徒众五、六人浮海而至,宋太宗礼遇优厚,裔然求印《大藏经》,诏允之^②。南宋时,日本僧人来华增多,《大藏经》的流传程度也更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南宋刊刻的《大藏经》每藏有五百函,六千馀卷,通过日僧传入日本的就有十部以上,其中不乏福州版、湖州版等^③。除了以《大藏经》形式传入外,许多单本宋代佛教史籍亦通过购买等方式传入日本。如宋熙宁五年(1072),京都大云寺僧成寻率众来到开封拜见宋神宗,除奏请赐予新刊佛经外,还购买不少宋代佛教史籍的单印本,如《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等^④。

明清时期大致是日本的江户时代,也是中日经济文化往来颇为受限的时期。“在整个江户时代,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仅限于长崎一港,其贸易方式亦受到严格限制,长崎是锁国时代日本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⑤这种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也使得往来中日之间的船只,成为当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很多丝绸、矿物、药品、皮革、涂料等中国物产,通过唐船来到长崎,大量的中国文献书籍亦是其中一类。这些传入到日本的书籍内容多为“当时的普通书籍,有经书、文学书、历史书、医书和本草书等等,其中文学书的数量稍多,但没有珍本。”^⑥在传入日本的文献典籍中,还有佛教文献,既有整套的《大藏经》,也有单本的佛教文献,其中亦包含一些清代佛教史籍。

传入日本的清代佛教史籍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原收录于《嘉兴藏》中的清代佛教史籍,随着《嘉兴藏》的传入而进入日本;一是单本清代佛教史籍传入日本。

明清时期到底有多少部《大藏经》传入日本?这些《大藏经》是哪种藏经?中日学者对此既有相同认识,又有不同之点。日本学者大庭修认为“《大藏经》输入在享保四年有三部,享保二十年有二部,元文五年有一部,宽保元年亦有

①魏承思:《中国佛教文化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2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日本国传》,中华书局,1978年,第14131-14135页。

③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

④(日)成寻编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⑤(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王勇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⑥(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王勇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36页。

一部。其中除元文五年的一部可以确认为入藏兴福寺外,其余诸本的下落及其竞价均一无所知。”^①即一共有七部藏经传入日本。而这些《大藏经》经其考证,均为明末清初时期刊刻的《万历藏》,即《嘉兴藏》。中国学者章宏伟认为江戸时期,《嘉兴藏》传入日本则有九部之多,这也反映了当时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繁盛^②。二者部数的差异,最大原因在于对日本宫内厅所藏《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以下简称“《舶载书目》”)中记录的“藏经”、“续藏”内容的统计上有偏差。如章宏伟认为在《舶载书目》出现的一些藏经,目录虽然不全,但是根据内容大小,应该判断为全藏。如“对于 279 函这样的巨帙,我们可以视其为‘整藏’。11-34 这一藏,从记载来看,有些混乱,但无疑是整藏。”^③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据,但通过对《舶载书目》中记录的“藏经”、“续藏”统计来看,这两种说法都值得商榷。

通过对《舶载书目》的爬梳,我们看到,该书一共有九处出现“藏经”字样,见表 1:^④

(表 1)

资料出处	时间	番船号	字样	部数
1.《舶载书目》12,第 2 页		32 番船	藏经	1
2.《舶载书目》17,第 33 页	享保四年		藏经	1
3.《舶载书目》17,第 33 页	享保四年		藏经	1
4.《舶载书目》21,第 74 页	享保九年	5 番船	藏经	2
5.《舶载书目》21,第 75 页	享保九年	9 番船	藏经	1
6.《舶载书目》46,第 29 页	元文五年		藏经	1(书名后附的是续藏目录)
7.《舶载书目》47,第 5 页	宽保元年		藏经	1(279 套)
8.《舶载书目》47,第 29 页	宽保元年		藏经	1
9.《舶载书目》48,第 2 页	宽保元年		藏经	1(有具体书名,包括正藏、续藏及本坊刊刻新书目)

出现“续藏”字样的共有八处,见表 2:

①(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王勇等译:《江戸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 405 页。
②③章宏伟:《〈嘉兴藏〉的刊刻及其在日本的流传》,《古代文明》2011 年第 4 期。
④表 1 和表 2 根据(日)大庭脩编著《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上、下)册(关西大学东西学研究所发行,昭和 47 年 1 月 20 日)数据统计而得。

(表2)

资料出处	时间	字样	函数
1.《舶载书目》4,5,第 54 页	元禄十四年	续藏	第三十九函、第四十函
2.《舶载书目》9,第 17 页	宝永年间	续藏	第四十三函
3.《舶载书目》17,第 33 页	享保四年	续藏	有续八十七函《铁碧禅师语录》一部,又续二十七函《药师直辨》一部,同三十函《子肃禅师语录》一部,同函《三坛传戒》、《缙门世谱》一部,同四十四函《美享义》一部。
4.《舶载书目》17,第 34 页	享保四年	续藏	续藏:旧板九十函去戊戌授九十一函,当乙亥岁九十三函。
5.《舶载书目》17,第 35 页	享保四年	续藏	又续藏:旧板四十三函去戊戌岁板,四十七函,当乙亥岁板四十六函
6.《舶载书目》17,第 35 页	享保四年	续藏	又续内新增加三部,《五家宗旨纂要》一部一本三卷,《无异禅师唐综》一部六十五卷、《叶如瀚禅师语类》一部一本六卷。
7.《舶载书目》46,第 29 页	元文五年	续藏	兴福寺寄进藏经之内续藏目录
8.《舶载书目》48,第 2 页	宽保元年	续藏	包括正藏、续藏及本坊刊刻新书目

大庭脩考证认为《舶载书目》中的“藏经”均指明末清初时的《嘉兴藏》，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嘉兴藏》刊刻时间起于明代万历时期，结束于清康熙年间，前后历经较长时段，且是陆陆续续、零星刊刻，故清初顺治时期的《嘉兴藏》就有正藏、续藏和又续藏之分^①。而传入到日本的“藏经”，指的是《嘉兴藏》全藏（正藏、续藏和又续藏的总和），还是只指《嘉兴藏》正藏？从大庭脩和章宏伟的数据统计上看，都没有区分这一点，故而才有上述七部、九部的分歧。

首先，《舶载书目》中的“藏经”指的是《嘉兴藏》正藏，而非全藏。《舶载书目》对“藏经”、“续藏”的概念有清晰的认识，如《舶载书目 17·享保四（乙亥）年改书籍》中记载“享保四年记：一藏经”，其后接着就记载“续藏 旧板九十函去戊戌授九十一函，当乙亥岁九十三函。又续藏 旧板四十三函去戊戌岁板，四十七函，当乙亥岁板四十六函。又续内新增加三部。《五家宗旨纂要》一部一本三卷，《无异禅师唐综》一部六十五卷、《叶如瀚禅师语类》一部一本

①关于《嘉兴藏》研究，成果较多，如蓝吉富《〈嘉兴藏〉研究》，《中国佛教泛论》，台北新文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杨玉良《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3期；韩锡铎《关于〈嘉兴藏〉及其重辑工作（上）》，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5年第2期等。不赘言。

六卷。”^①这种藏经、续藏、又续藏的排序方式明显就是正藏、续藏、又续藏的排列方式。又如,《舶载书目 46·元文五年监阅书目》记载有《兴福寺寄进藏经之内续藏目录》开篇即是“续藏经值書一”,接着就是续藏目录,首部经书是“第一函至第八函《华严经会本大抄》”。可见,“兴福寺寄进藏经”,此“藏经”仍然指的是正藏,而非全藏,否则没有必要再续藏^②。再如《舶载书目 48·宽保元年持渡藏经目录》,目录首起明人冯梦楨的序,接着是《刻藏缘起》,再次是正藏目录,起于《大般若经》六百卷 一百五十本,终于《楞严经注疏》、《御注莲华经》二卷。正藏结束后,有一价格调整说明:“每藏旧价纹银一百八十一两陆钱零二分,顺治十六年遵前宪史给示,每史廉经,百叶纹银八分,共该银一百二十四两二钱三分,外加套,银四十一两三钱,二项共一百四十五两五钱三分……(后康熙三年调整价格)两项共该银一百十六两三钱二分九厘,康熙三年十月奉宪重订。”^③价格调整说明结束后,有“新增诸方及本坊新刻经目附后”,其后又分“又续藏目”。从目前看,《宽保元年持渡藏经目录》是一次性从中国进入日本、明确指明是《嘉兴藏》全藏的目录,其排列顺序与中土《嘉兴藏》有相同地方,亦有不同之处。相同在于多是按照正藏、续藏、又续藏顺序排列,不同的是,本目录多了“新增诸方及本坊新刻经目附后”,这就导致了一些不是《嘉兴藏》收录的书籍也会进入这个目录中,如《宽保元年持渡藏经目录》最后还收录有《宗门杂录》、《老子道德经解》、《金陵梵刹志》等书籍,但显然这些书籍不是《嘉兴藏》中书籍,但也被收录至《宽保元年持渡藏经目录》。

其次,《舶载书目》中较为完整传入日本的“续藏”只有三次,即享保四年、元文五年以及宽保元年。其余的续藏内容,皆为零星散本。如上述提及的元禄十四年进入日本的续藏三十九函,《卓峰珏禅师语录》一本一卷、《玉眉亮禅师语录》一本一卷等。又如元禄十四年的续藏四十函,《东山梅溪度禅师语录》二本十卷。又如享保四年进入日本的续八十七函《铁碧禅师语录》一部,又续二十七函《药师直辨》一部,同三十函《子肃禅师语录》一部,同函《三坛传戒》、《缙门世谱》一部,同四十四函《美亭义》一部。这些续藏都只是部分内容,而非整个续藏。

综上所述,删重去复,根据《舶载书目》中所记载资料,在康熙年间至乾隆时期,约有三部《嘉兴藏》全藏(包含正藏、续藏、又续藏)传入日本,即享保四

①(日本)大庭脩编著:《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上),《舶载书目 17·享保四(乙亥)年改书籍》,关西大学东西学研究所发行,昭和 47 年 1 月 20 日,第 33-35 页。

②(日本)大庭脩编著:《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下),《舶载书目 46·元文五年监阅书目》,第 29 页。

③(日本)大庭脩编著:《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下),《舶载书目 48·宽保元年持渡藏经目录》,第 64 页。

年、元文五年、宽永元年。传入日本的《嘉兴藏》正藏有七部,即《舶载书目》12中不详年代1部、享保4年1部、享保9年3部、宽保元年2部。传入日本的《嘉兴藏》续藏以及又续藏,较为完整的有三部,即上文提及的享保四年、元文五年以及宽保元年,其余的续藏内容,皆为零星散本。此外,还有些不属于《嘉兴藏》内容,但又是楞严经坊刊刻的书籍也随之传入日本。

不管有多少部《嘉兴藏》进入日本,不可否认的是,《嘉兴藏》在江户时期随着海上商业通道确实传播进日本,而这亦意味着《嘉兴藏》续藏以及又续藏中收录的清人佛教史籍亦进入日本。根据《舶载书目》统计,这些随着《嘉兴藏》进入日本的清代佛教史籍有以下所列:

书名	《嘉兴藏》中位置	资料出处
《别庵和尚同门录》	续藏三十九函	《舶载书目》4、5《元禄十四年书目》第54页
《黔南会灯录》	又续藏四十三函	《舶载书目》9《宝永年中书目校阅写》第17页
《缙门世谱》	又续藏三十函	《舶载书目》17《享保四年改书籍》第33页
《醒世录》、《祖庭指南》、 《高僧摘要》	续藏第五十七函	《舶载书目》46《元文五年监阅书目·兴福寺寄进藏经之内续藏目录》第29页
《无依道人录》、《千松笔记》、 《先觉宗乘》	续藏第五十八函	《舶载书目》46《元文五年监阅书目·兴福寺寄进藏经之内续藏目录》第29页
《南岳单传记》	续藏第八十五函	《舶载书目》46《元文五年监阅书目·兴福寺寄进藏经之内续藏目录》第29页
《金陵梵刹志》、《华严感应缘起传》	又续藏目	《舶载书目》48《宽保元年持渡藏经目录》第64页

除了《嘉兴藏》中清代佛教史籍进入了日本,还有一些收录在其他丛书中的清代佛教史籍也随着丛书进入日本而进入日本。如在享保十九年二月,二十八番船购进书中就有《说铃》一部,其中就包括有“《见闻录》嘉善徐岳季方、《冥报录》钱塘陆圻丽京、《现果随录》灵隐戒显晦山、《果报闻见录》杨式传、《心徵录》乌山徐庆”等清人撰述的佛教史籍^①。

此外,一些单本清代佛教史籍也随着番船购进书渠道进入到日本。如“《五叶弘传》六本廿三卷,清南山岳兜率嗣祖沙门和安磐石氏辑、《洞宗汇选》十本共三十五卷,禹航龙泉嗣祖沙门智考徵辑。”^②又如,《舶载书目》12记

①(日)大庭脩编著:《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下),《舶载书目》43·享保十九年二月第7页。

②(日)大庭脩编著:《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上),《舶载书目》10·宝永四丁亥岁改第16页。

载二十九番船购进有清释性统编撰的《普陀山志》一套、《舶载书目》²⁵又记载有购进《普陀山志》一部四本。这些单本清代佛教史籍的性质或是与日本佛教有很大关系的《普陀山志》，或是在日本佛教具有很大影响的曹洞宗史籍，可见日本购进单本佛教史书，有一定的选择性。

此外，少量清代佛教史籍在清末民初也进入了日本，明治三十八年至大正元年（1905-1912），日本学者前田慧云、中野达慧等人编集、收录《大日本校订藏经》未收的佛教经典，撰刻续藏。在其编撰过程中，多次向中国学者求助，收集中国的佛教经典，编入日本《续藏经》中，其中以金陵刻经处的杨文会帮助为最大^①。在杨文会的《等不等观杂录》卷七、八中有《与日本笠原研寿、南条文雄书》、《与南条文雄书》、《与日本藏经书院书》、《与日本松林纯孝书》等四十余封书信往来，尤以与南条文雄往来书信较多，其中多是谈及双方互相帮助购买、借刻、赠阅佛教经典事宜。如杨文会言：“华历七月间，岸田君寄到手函，如亲雅范。承赐梵文《般若心经》及《尊胜陀罗尼》一册，欢喜无量。”^②《与南条文雄书七》中亦言：“五年前接到赐函，并书籍数种……近日在北京觅得梵文《字母谱》一卷、《身心语》一部，均系番经式样。兹因舍亲苏少坡赴贵国之便，特以奉赠。”^③《与南条文雄书十三》中亦言：“照来信。寄上《妙玄节要》二本、《选佛谱》二本、《西方公据》一本、《往生论注》一本，奉赠赤松君。又《起信裂网疏》二本、《翻译名义集》六本、《西方公据》一本、《往生论注》一本，奉赠阁下。”^④

可见，晚清民国初期，杨文会与日本学者在佛教文献之间的交流还是很频繁的。其中，在日本学者求购中国佛教文献过程中，亦有少量清代佛教史籍由杨文会流通到日本。他在《与日本南条文雄书十六》中言：“（续藏经目录）第一二一七《禅灯世谱》四卷，未见。敝处觅得《佛祖宗派世谱》八卷，大约与《禅灯》相同，呈备采择。”^⑤《佛祖宗派世谱》即为僧人介庵悟进在顺治十一年编撰的一本关于禅宗五家法统世系的佛教史书。但查阅杨文会与日本学者的来往书信，其中涉及清人佛教史籍的是少之又少，大多数为讲述佛教教义、教理的佛经文献，可见，晚清中日两国相互流通的佛教文献多为佛经，佛教史籍为少数。

①参见杨文峰：《〈己续藏经〉的编撰及其史料价值》，《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3期。

②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卷七《与南条文雄书五》，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2页。

③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卷七《与南条文雄书七》，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卷》，第133页。

④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卷七《与南条文雄书十三》，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卷》，第138页。

⑤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卷八《与南条文雄书十六》，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卷》，第141页。

二、清代佛教史籍在朝鲜的流传

中朝两国历来也是唇齿相依,文化联系比较密切。自公元四世纪朝鲜三国时代一直到高丽王国时期,文化交流十分繁盛。如,新罗向唐朝派出大量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又如,自宋太宗建隆三年十月至南宋孝宗隆兴二年三月,二百零三年中高丽遣使来宋朝达三十四次以上,非正式外交途径,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到南宋兴元年,二百六十六年间,宋代商人以民间贸易方式去高丽的约有一百三十次,五千余人^①。明代亦有很多朝鲜使团往来于中朝之间,“明朝这二百七十餘年间,是中朝两国关系最密切的时期,朝鲜国每年正式向北京派出三批使团,如果遇到特殊事件,朝鲜会立即增派使团赴京。”^②

清初的中朝关系有些变化,至乾隆时期则又回到了原来的宗藩外交关系上。“清兵入关后,朝鲜一度希望联络日本和明郑政权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给清鲜宗藩关系带来若干变数和不稳定性,但随着大清政权的稳定和儒化政治的推行,朝鲜不得不正视现实,摒弃视大清为夷狄的理念,并掀起北学运动,从而自觉接受大清的宗主地位。至乾隆朝,清鲜两国终于形成稳定而典型的宗藩关系。”^③康熙、乾隆时期,朝鲜亦派出了大量的使团觐来到北京。如朝鲜肃宗三十九年,派遣使臣金昌集、尹趾仁出使燕京。景宗三年,派遣使臣密昌君等出使燕京。英祖五年,派遣使臣团赴燕京。正祖二年,派遣使臣李殷、徐浩修赴燕京^④。可见,当时朝鲜使团至北京较为频繁。

佛教文献交流亦是中朝两国十分重要的盛事之一。高丽以佛教为国教,对《大藏经》相当重视,曾数次向宋王朝请赐《大藏经》。如宋太宗淳化二年,高丽使韩彦恭来贡,求印佛经,宋太宗即以《大藏经》等佛教文献赏赐之^⑤。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高丽入贡求佛经一藏,真宗亦从之^⑥。朝鲜时代的佛教,已经由高丽时期的繁盛走向了衰落。前有“郑兰宗言佛氏妖书,何以比诸圣经,许琮亦上书斥佛。”后有“成宗二年,王大妃命购佛经于中,朝执义孙舜孝言:‘皇帝求海东青,我国知皇帝好猎,臣恐中国人亦疑殿下好佛也。’上告太妃寝之

①杨渭生:《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②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序》,《燕行录全编》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③魏志江:《论清兵入关后大清与朝鲜的关系——兼与韩国全海宗教授商榷》,《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④(朝鲜)金致仁等:《增补文献通考·艺文考》,见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2890-2891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高丽传》,中华书局,1978年,第14040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高丽传》,中华书局,1978年,第14044页。

……中宗时,并罢两宗禅教,自是其说遂微。”^①朝鲜时代的佛教尽管已属衰落,但是仍有一些佛教文献进入朝鲜,其中也包含若干清代佛教史籍^②。根据《朝鲜时代书目丛刊》、《韩国所藏汉籍总书目》统计,清代佛教史籍流传到朝鲜的约有十余种:彭绍升《居士传》、张心泰《大明三藏圣教目》、《大清重刻龙藏汇记》、吴调元《同归集》、徐道《同原录》、了圆《法华灵验传》、周春《佛尔雅》、果性《佛祖正传古今捷录》、瑞璋《西舫汇征》、《续传灯录》、心圆居士《揅黑豆集》、周克复《历朝华严经持验记》、《金刚经指验记》、《法华经指验记》、《观音经指验记》、守一《重刻佛祖道影》、汪孟鋈《龙井见闻录》、《五大部直音》以及《说铃》丛书中的《现果随录》、《我信录》等。

这些佛教文献进入朝鲜的途径,由于具体资料的缺乏,不好断定,但与其他汉籍进入朝鲜的途径大同小异,不外乎是中国皇帝的赏赐、朝鲜人到中国的购买、中国人和本国人的献书、民间的征求访书等几种^③。这些清代佛教史籍进入朝鲜后,有的是被皇室收藏,进入皇家的大内书库中,如吴调元《同归集》、徐道《同原录》、释果性《佛祖正传古今捷录》等书籍均有“李王家图书之章”字样^④。有的则是被重刊、重刻,如清僧了圆编撰的《法华灵验传》,流传到朝鲜后,顺活九年(1652)壬辰二月日,全罗道宝城郡五峰山开兴寺重新开板刻印^⑤。又如,周克复编撰的《历朝华严经持验记》、《金刚经指验记》、《法华经指验记》、《观音经指验记》,传入朝鲜后,肃宗12年(1686年)金华山澄光寺重新刊刻^⑥。

三、少量清代佛教史籍在越南的流传

中越两国佛教交流自两宋时期就十分频繁,如北宋政府组织雕印《大藏经》后,越南政府多次请求赐赠,两国之间《大藏经》交流就有八次之多^⑦。再如,北宋禅宗名师雪窦重显的弟子草堂禅师南下安南,创立草堂禅宗派^⑧。明清时期的中越佛教交流,进入了“一个高潮期,不仅体现为大量的岭南禅师赴越

①(朝鲜)朴周钟:《东国通志》卷16,见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6册,第2773-2774页。

②根据《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统计,在诸多朝鲜时代的藏书目录中,或多或少都记载有来自中国的佛教文献。如《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3册1594、1697页著录《法华经》、《华严经》,1636、1647页著录《楞严经》、《大明法数》,第5册2252页中页也著录大量的中国佛经文献。不一一列举。

③参见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1册,第13-17页。

④(韩国)全寅初主编:《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韩国学古房,2005年,第943、1025页。

⑤(韩国)全寅初主编:《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第991页。

⑥(韩国)全寅初主编:《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第1050页。

⑦戴蕃豫:《中国佛典刊刻源流考》,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⑧参见张小欣:《浅谈禅宗在越南历史上的传播及其文化影响》,《东南亚》2003年第2期。

南弘扬佛法,为越南佛教的复兴和发展奠定人才基础,还体现为越南禅师之北上岭南习禅、取法和越南对中国佛教典籍的输入和刊印。”^①这种佛教文化交流也决定了中国岭南地区佛教对越南佛教的影响,较多的中国佛教文献随着岭南僧众,或者越南僧众到岭南求法的方式传播到越南^②。其中有两部清人著述的佛教史籍,亦皆与岭南佛教有关联。一是《鼎湖山志》八卷,鼎湖山位于广东高要县境,为端州之名山,佛教之圣地,历代不少高僧大德皆驻锡于此。清代高僧成鹫撰述《鼎湖山志》,记载此山寺之历史地理、人文环境以及历代高僧大德的光辉史迹。此书亦传播到越南,绍治四年(1844)越南和尚福田于北宁端明寺重印^③。再有《六道集》五卷,广州南海宝象林沙门弘赞在惨辑,明命6年(1825)越南红蓼社人阮谢再刊,成泰乙巳年(1905)河内灵光寺再次重印,有严春广的再版序言^④。

总体而言,在清代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下,清代佛教史籍仍然随着各种各样的途径进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邻国,广为流传。其特点有二:一是由以前官方与民间融合的流传方式转化为民间流传为主。两宋时期的佛教史籍在向国外流传时,民间与官方都起到一定作用。如宋代商人与日本、朝鲜之间典籍的交流,日本僧人成寻购买《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等都是民间流传,但更重要的流传方式则是以官方名义赏赐《大藏经》与邻国,无论是日本、朝鲜,还是回鹘、西夏等多以进贡乞赐的方式获得《大藏经》。但是清初《嘉兴藏》流传到日本则主要是以民间购进为主,官方不参与。二是清代佛教史籍在国外流传的范围很广,且多为清代邻国,地域接壤决定了清代佛教史籍传入的性质。从上述可知,清代《嘉兴藏》所流传的国家或是东部沿海地区与清代东部疆域接壤的国家,如日本、朝鲜;或是南方与清代比邻的国家,如越南。而这种地域范围就造成了清代佛教史籍会有选择性的进入国外,如进入到日本的单本清代佛教史籍或是曹洞宗僧人撰述的史书,或是深受日本喜欢的普陀山文献。又如,传入到越南的多为广东籍僧众撰述的佛教史书,这些都与地域性有一定的关联。这些清代佛教史籍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地区后,或被收藏,或被重新刊印流传,对东亚佛教史学乃至东亚佛教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作者简介】曹刚华,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教授。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①谭志词:《十七、十八世纪岭南与越南的佛教交流》,《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3期。

②越南佛教文献不少是重刊重印自岭南佛教文献,如《感应高王观世音经》,据光绪癸卯年(1883)粤东前合碧斋刻本重印。(见刘春银、王小盾等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元震企业有限公司(台北),2002年,第508页。)在此书目中,来自岭南佛教的文献较多,不一一列举。

③刘春银、王小盾等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史部·地理·外国》,第326页。

④刘春银、王小盾等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子部·佛教·著述》,第540页。